

兔嘲男孩（Jojo Rabbit）

影片介紹

《兔嘲男孩》有別於早期電影對於猶太人悲慘遭遇的見證與控訴，¹其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年僅 10 歲的小孩喬喬貝斯勒（“Jojo” Betzler）。這部片更為別出心裁之處是，主人翁不僅是個德國男孩，甚至還支持希特勒、加入德國少年團，是個名副其實的「小納粹」。

跟不少同年齡的小孩一樣，喬喬也有個「想像的朋友」。不一樣的是，他的「朋友」卻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更有意思的是，在電影裡與今日大眾所認知的希特勒形象不太一樣，喬喬眼中的「希特勒」背負著所有德國人命運的同時，卻又格外顯得搞怪、頑皮、童心未泯。導演藉由純真的兒童之眼翻轉希特勒形象，將希特勒刻劃成片中之於喬喬不可或缺的綠葉。作為極權國家意識形態的化身，他時不時地在喬喬身旁探頭探腦，激勵著男孩，同時也作為喬喬內心的自我對話與辯證，強化了整部電影的張力與趣味性。

與其說這部片是納粹電影，毋寧說是一部成長電影：聚焦在納粹德國（Nazi Germany）統治下，喬喬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認同掙扎。這裡的認同，不只涉及自我生命的肯認，更關乎國族、理念與價值。《兔嘲男孩》訴說的不只是喬喬的個人故事，而是極權統治下每一個平凡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皆可能遭遇的難題。

本片藉由喬喬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認同掙扎，聚焦在納粹德國（Nazi Germany）極權統治下，每一個平凡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幾乎都籠罩在極

¹ 相關電影諸多，有興趣者可參考：《夜與霧》（Night and Fog, 1956）、《紐倫堡大審判》（Judgment at Nuremberg, 1961）、《浩劫》（Shoah, 1985）、《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 1997）、《戰地琴人》（The Pianist, 2002）等。

權統治者為穩固政權的思想教育下，其影響延續至極權結束後，仍有許多人緬懷過去，該如何去除是轉型正義路上的重要課題。

背景介紹：猶太大屠殺

喬喬成長的背景是納粹統治下的德國。隨著 1929 年經濟大恐慌的爆發，使得德國失業率屢創新高、通貨膨脹加劇，德國民眾對於在一戰後與協約國簽訂極不平等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的軟弱政府，只感到愈發憤慨。失業率、通膨以及各樣不滿疊加形成的民怨，恰是極端主義發展的絕佳溫床，給了有心人士操作的機會。

希特勒透過在演講、報刊上傳遞模稜兩可的事實、各式未經證實的謠言、似是而非的說法，並且訴諸民族情緒與國家榮耀等極具煽動性的言論，希特勒及其所率領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簡稱 Nazi Party，即為「納粹黨」）迅速吸引了大量不滿現況的群眾。

納粹黨對於宣傳技術熟稔且精心地操弄，帶起了全國對希特勒個人的狂熱忠誠。有趣的是，在電影開頭，導演選用的背景音樂，是披頭四（Beatles）經典名曲〈I want to hold your hand〉——別具巧思地藉由在 1960 年代促成了披頭四風潮（beatlemania）的歌曲，同時畫面穿插德國人在納粹演講上熱情簇擁的歷史畫面，黑色幽默地諷刺納粹時期的狂熱（cult）。沒幾年的時間，希特勒隨即在 1933 年入主了德國的政治中樞。

在納粹的觀點中，德意志民族之所以陷入一戰後的難堪窘境，是因為染上了「猶太瘟疫」。在社會達爾文理論、優生學構想的思維影響下，希特勒提出了一系列「清除」猶太人與「劣質者」（包含辛提人〔Sinti〕、羅姆人〔Roma〕、共產主義者、同性戀、身障人士等）的方案，希望能藉此「純淨日耳曼人的優越血統」。

他們一方面透過制定相關歧視法律，在傳媒、教育中刻意醜化、非人化（dehumanize）猶太人，並且默許民眾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則是有系統地逐步制定處置猶太人的方式。從起初的「驅離」（deportation）、「安置」（resettlement），一直到在 1941 年轉往採取「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方案——將猶太人及其他「劣質者」送往散落納粹統治境內的集中營與滅絕營。正因為納粹對猶太人系統性的種族滅絕行動是如此慘絕人寰、前所未聞，西方國家中特別留下了一個專有名稱作為記憶：猶太大屠殺（英語世界稱之為 Holocaust，希伯來語則稱之為 Shoah）。

這場大屠殺的龐大工程之所以能實現，背後仰賴許多人的默許與主動、被動地協力。需要有人檢舉、密告誰是猶太人，需要有人負責統計、登記、抓捕這些「劣質者」，亦需要有人負責運送、監管、督導，甚至執行殺害指令等。然而，這些協助殘忍滅絕的「共犯」，卻是能在街頭巷尾相遇，再普通不過的一般民眾——這樣的難堪窘境，也成了戰爭結束後，英、美等戰勝國在清理、究責這樣的「納粹遺產」與極權主義社會的頭痛難題。

探討議題：極權生活

我們必須先談談：為什麼喬喬會將希特勒看作他的「想像朋友」？

有魅力且極具煽動性的領袖，被人們視為偶像、救世主的案例，在極權政治體制下十分常見。當資訊被國家壟斷，任何不被政府所允許的知識、書籍都難以取得，舉目所及，都是納粹標誌、旗幟以及各式與希特勒相關的符號，國家無孔不入地在人們的生活所及進行政治宣傳，也使得人們的理念與價值判斷漸漸受到影響。若是連成年人都已然如此，心智尚在發展中、仍未定型的幼童更是難以從這之中遁逃：小孩們自出生以來所接觸到的一切，都是極權政府有意地塑造。

透過宣傳與教育的雙管齊下，兒童在家裡、在學校接觸到的資訊，一再重複著對國家敵人的醜化、對國家多麼光榮與當權者多麼強大的渲染。極權國家如納粹德國就如同吹笛手般一步步地誘使學童走上政府所期待的道路。當舉目所及皆是黨、領袖、國家，小孩眼中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當然無需多言。這正是本片中希特勒成為喬喬的重要他人的背景——行為舉止必須向他看齊之外，甚至連作夢、想像都有著他的身影。

如今，我們知道這樣的教育叫做「洗腦」（brainwashing）。但對於身在其中的人來說，這宛如魔咒一般，無法輕易解除。無比崇高的領袖正扮演著喬喬的想像朋友，在他身旁反覆地耳語，影響他的價值判斷。這使得喬喬與其他納粹統治下的學童們，更難以逃出極權主義的迷霧。

甚至，我們或許可以說，喬喬的這位「想像朋友」同時也是他內心的小警總——也就是蓋世太保（Geheime Staatspolizei，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這位「希特勒」徘徊在他的身旁日夜監視，使他自我審查其言行，深怕任何有一點點的「踰矩」而背離了領袖的旨意，或者可能對於家人、朋友帶來惡果。與臺灣的白色恐怖相同，這樣的氛圍使得不少人選擇噤聲，告密親友，甚至自告奮勇支援極權的運作以獲取好處。

另一方面，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自願或被動地全然擁抱極權統治的惡，還是會有人選擇在黑暗的時刻挺身抵抗不公義的現實。所謂「抵抗」，一種如喬喬的父母暗地協助反抗軍、拾起武器，另一種則是表面順從納粹卻暗中藏匿、掩護猶太人，避免更多無謂傷亡。無論哪一種的抵抗方式——激進或者虛與委蛇，仍都違反了納粹的政策，曝光便將危及身家安全。

在《兔嘲男孩》中，喬喬一家收留了喬喬姊姊的猶太朋友艾莎（Elsa）。隨著艾莎的現身，喬喬意外接觸到學校、德國少年團刻意非人化描繪的「那類醜陋猶太人」，他開始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了帝國神話背後

的不太對勁。現實與教育中的落差，成為了喬喬反省的契機。活生生且自由奔放的猶太人艾莎，提供了他另一個血淋淋的對照——相對於他那號召民族情感且威權、規訓教條的想像的朋友。艾莎的出現，使喬喬在日常中辨認出了極權的陰影，進而產生對人性的反思。

聚焦臺灣：獨裁者象徵的多重崇拜

這是一部以歷史為題材的電影，故事結局是：盟軍攻入喬喬生活的城市，「解放」了納粹統治下的人們。不過《兔嘲男孩》格外令人驚喜的是，意在言外地選用大衛·鮑伊（David Bowie）著名的〈Heroes〉當作背景音樂——這首當年意外促成了柏林圍牆拆除、蘇聯垮臺的經典名曲。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停在了喬喬與艾莎身上，兩人在家門前微笑地對望著彼此，然後有些笨拙地跳起了舞來。

然而，納粹的故事不會只結束在此。電影沒有說的是，遭遇極權／威權主義的社會要如何面對過去的傷痛，才是更為棘手的難題。喬喬與艾莎要怎麼面對他們各自的創傷？社會的傷痕又應如何撫平？如何處理這零零總總的問題，都牽動著社會日後的和解與共生。在德國的例子裡，因為加入了戰爭的因素，相對順利地由戰勝國強硬地推動：以大審來清算納粹「戰犯」，並且積極去除社會中的極權主義符碼與領袖崇拜等。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當年促成希特勒熱潮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長年被禁止再版，遲至2016年，巴伐利亞邦才因法律上版權年限屆滿，無法再據以禁止再版；但予以出版時，原則仍應附帶批判性的註釋，避免淪為煽動仇恨或鼓吹違憲組織的工具。

這樣慎重且嚴厲的處理方式，對於臺灣來說，幾乎可說是不可思議——儘管脫離了戒嚴近40年，至今街道上、校園與公家機關裡，仍偶能見到促成當年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的蔣介石的銅像，更不用說錢幣、紙鈔上

有蔣介石的人像，有些教室的牆上仍掛有蔣介石的遺像，甚至首都中心還有座紀念蔣中正的廟堂。據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 2021 年 12 月的全面盤點，全臺仍有 830 座蔣介石塑像及 84 幅遺像置於公共空間，威權紀念命名（包含以蔣介石或蔣經國命名之樓、廳、堂等紀念場所、街路、村里、機關／構以及校名）亦達 580 處。

今日的臺灣社會，我們偶爾仍能聽見頌揚威權時代的言論，或者指責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死難者死有餘辜——是否因為這樣對歷史與轉型正義的漠然，才使臺灣社會經常發生穿著納粹裝扮嬉戲而鬧上國際的新聞？正如同《兔嘲男孩》這部電影所暗示的，各式黨國與領袖的紀念物、符號與威權相關的政治宣傳，可能如何地形塑、洗腦著一個人，這對於今日的臺灣社會同樣影響深遠。

在那個年代裡，政府禁止人們想像，強力地宰制了媒體與出版業，查禁不喜歡的言論、書籍、雜誌、音樂、電影。人們只能在政府允許的範圍裡作夢——夢裡必須有蔣介石與黨。那麼多年過去了，今日的臺灣社會，還有多少人還沒從喬喬當年的幻想中醒來？因為社會尚未正視並反省當年不光明的歷史，去除威權象徵如中正紀念堂，並非是破壞部分人們對昔日的記憶，更重要的是，它也使我們重新思索歷史的意義，理解他人之創傷，並且也有重新討論都市規劃的新空間，同時深化民主的意涵。

因此，該問的，從來不是「為什麼要去改變它？」而是「為什麼時至今日它還能在那裡？」以及，對於「我」，一個司法人員、一個公務員、一個教職員、一個公權力的協力者，或者更根本的一個平凡百姓而言，可以為此做些什麼？

延伸閱讀：

安妮·法蘭克（1947/2013），《安妮日記》，呂玉嬋譯。臺北：皇冠。